

回顾 2011

女性命运的探究

马晓丽的短篇小说《杀猪的女兵》令我惊叹。这篇小说的成功在于作家采取了女性的视角来看待女兵的命运,在当下军事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特别是对于作为女兵的女性心理变化的描述细腻而深刻,可谓别出心裁之作,也是意味深长之作,更是作为军旅作家所特有的敏锐之作。这篇小说的寓意较为丰富,表面上看来,小说乃是描述一位复员女兵杀夫前因后果的离奇故事,作家层层推进,不断设置悬念,又层层予以解扣,使得小说在阅读中充满了快意,显示了作家游刃有余的叙事技巧和能力。但进一步来看,作家在小说中又处处充满了问题意识,特别是对于女兵杀夫原因的追问中,还原了女兵因为杀猪并被塑造成为典型的过程,具有一种荒诞和反讽的意味,并与最后的退役和杀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塑造典型的行为则成为作者嘲弄和批判的用心所在,具有鲜明的意义。但这还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对于作为女性心理如何扭曲和变态的审视和处理,显示出作家对于女性在军队这个男性作为主导群体中生存的困境与异化,而杀猪与杀夫这种特殊或激烈的行为,不过是一种小说叙事经营的需要而已。马晓丽的这篇小说对于理解 and 思考女性在军队中的身份与角色,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卢一萍的中篇小说《索狼荒原》也是一篇关于军营中女性命运的小说。卢一萍曾出版过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描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中的女性命运,他的这篇《索狼荒原》其实与他的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很有异曲同工之处,甚至可以看作是其中部分素材的改写,但小说相比纪实文学,对于触摸人的心灵则更为自由也更为饱满。在这篇小说中,作家将一位年轻女兵柳岚设置到了一个荒原上的诸多男性之中,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而非一个独立的个体。因此,小说中的女兵柳岚存在的最大使命就是按照组织的决定,成为英雄营长的妻子,作家在这里给予了主人公内心以非常细腻的描述,从最初的尊敬、厌恶、反抗到最终的顺从,而与目前众多类似的小说所不同的是,卢一萍在这部中还设置了一个线索,便是营长与被管教的土匪妻子的恋情。小说的结尾达到了高潮,乃是营长的妻子与情人同时生产的不同过程,紧张激烈的事件发生,折射出人物内心巨大的心灵煎熬。这篇小说同样带有强烈的反思意味,但笔者更为同情作为女兵的柳岚,实际上她是受到伤害最为严重的一个,也是最具悲剧色彩的。

无论是马晓丽的小说《杀猪的女兵》还是卢一萍的小说《索狼荒原》,都将笔触对准了军营中的女兵,对女兵的描述也都带有一种深深的怜爱之情,但相比之前的很多关于军中女性的描述,那些女兵与其生存的环境存在着较为强烈的不适应感与不和谐感,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扭曲和伤害,而她们的人生和命运也常常被戏剧性地改写。女性在造物主的眼中,应是充满幻想和浪漫的,也是柔软的、感性的、善良的,她们与具备严肃性和纪律性的部队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战争与军队中的女性便难免会产生一种变异感,如何理解和把握这种变化甚至是异化的程度,以及对于女性自有的特质的伤害程度,则是需要细心对待的,而这两篇小说就是注意到了这种异化与伤害存在的可能性,这正是

近年来的军旅长篇小说无论是在生活质地、思想深度还是文学性等方面均有尚待提升之处。诚然,作家个体的创作都是阶段性的,状态的起伏与调整本属正常,文学界也有创作“大年”“小年”之说,然而若将军旅长篇小说作为现象统而观之,最令笔者担忧和焦虑的却是作品数量的逐年下滑,已从5年前的平均三四十种,下降到近两年的年均不足20种。据从有关出版登记与统计部门了解,2011年中国长篇小说产量在4300部以上。而军旅长篇小说产量的下降,与长篇小说出版市场的发展繁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鲜明的对照。没有了一定的数量作为基础和支撑,军旅长篇小说的发展前景似乎更加黯淡。而就在这现有的数量里,军旅作家作品所占比重也在迅速降低,甚至不足半壁江山,若再细察,则发现专业军旅作家如何保持创作活力更应值得重视。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里,2011年度值得一说的军旅长篇小说有苗长水的《军事忠诚》、裴指海的《往生》、黄国荣的《碑》、雪岛的《琵琶行》、沉石的《谋杀》、菜刀厂的《魔鬼连》、乔信明和于玲的《掩不住的阳光》、阎欣宁的《遵义!遵义!》、哈金的《南京安魂曲》、海飞的《向延安》、李燕子的《咆哮的鸭绿江》、张品成的《红药》、赵冬苓和长缨的《中国地》、李晓敏的《抗战枪王》、高杰贤的《撤退》、王筠的《长津湖》、文清丽的《渭北一家人》以及刘长富的《神圣的守望》。在这18部作品中,军旅作家有8部,而专业军旅作家只有4部,“70后”的新一代军旅作家只有两部。2011年度的军旅长篇小说留给笔者最深的两个印象便是“类型化叙事的强势”与“现实性写作的孱弱”。

当中国电影开始进入大投入、高票房、类型化的全新发展阶段时,中国文学领域的类型化写作也早已开启,并渐渐成为一种主流和时尚。从青春文学、都市白领文学到铁血小说、官场小说、穿越小说等等,文学的类型化同电影的类型化一样,都是商业时代、大众文化传播主导下,文学艺术商品属性被强化和放大的趋势。类型化的文学与类型化的电影就像超市中摆放的货品一样,通过自身特征的集约化呈现和标签化的定位摆放,能够更方便快捷且有效地吸引特定消费群体的目光,最终实现文化的定向传播与快速消费。近年来的军旅长篇小说正在成为又一个类型化了的文学场域和题材空间,毕竟,新世纪初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全面

非典型与小概率——2011年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佳作评述

□朱航满

这两篇小说的深层意义所在,在当下军事小说创作中也是很有意义和突破的地方所在。

底层叙事的张力

王凯的小说常让我想到朱苏进早年的小说作品。一是朱苏进的小说善于描摹当代军人内心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他们对于权力和欲望的渴求和追逐,并由此引发的具有震撼性的悲剧;其二是朱苏进笔下的人物多是军营中的失意者,他们虽然具备种种优秀的禀赋和特别才能,但往往因为性格或者气质等原因而终不得志。朱苏进小说中的这些特点,在王凯的小说中也都具备,但不同的是,王凯笔下的人物大多是部队基层连队的小人物,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和禀赋,尽管他们有着十分强烈的个人欲望,但都是比较世俗的个人心愿,与朱苏进笔下人物的梦想和欲望相比,王凯笔下的人物明显是世俗和庸常的,而朱苏进笔下的人物则显得孤傲与高贵。朱苏进小说中的人物更容易作为一种理念的产物,尽管缺憾诸多,但易于让人敬慕;而王凯的小说则更为接近现实生活,也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引起我上述遐想的,是由于我集中阅读了王凯在2011年发表的三篇小说,分别是短篇小说《任务》、《魏登科同志先进事迹》和中篇小说《迷彩》。《任务》中的主人公连长伍秋原是不到重任而被最终安排转业的基层干部,《魏登科同志先进事迹》中的魏登科是兢兢业业工作但不幸遭遇事故的连队士官,《迷彩》主人公则是深陷个人欲望与爱情两难境地的基层部队宣传干事唐多令。加之我所读过的王凯小说《换防》和《终将远去》,前者是因为顶撞领导而被发配的机关干部,后者则是过于老实勤恳而无法留队的炊事班士兵。似乎在王凯的笔下,无论是连队的干部还是士兵,或者是基层部队机关里的干事,都被预设成一种极为失意的特殊人生处境之中。这种角色的预先假定,与作家所要描述的人物性格、品质、梦想和命运,往往形成一种极大的张力,使得小说在创作中易于处理素材,也易于制造矛盾和冲突,并形成一种既感伤又幽默的悲剧美学。

在王凯的小说《任务》中,主人公伍秋原即将转业,但却时时关心着驻地的一位曾在战场上负过伤的退伍老战士,他的个人处境与内心的高贵和善良,形成了一种鲜明强烈的对照。《魏登科同志先进事迹》中的魏登科则是朴实勤恳和专业技术精湛的事故受害者,他的遭遇与上级最终处理结果的反差,让人读后愕然。作者在小说中特别采用了一种通过查阅被遗忘的谈话记录的形式,拼接了一段往事和一个普通的小人物的命运,更增添了几分悲伤和无奈。而《迷彩》中的主人公唐多令是对于爱情和欲望难以权衡的宣传干事,他对于爱情的追逐与个人事业的不断受挫形成一种明显的反差,而爱情与事业的结果同他的煎熬和付出之间,却并没有形成应有的回报。除了这种叙事上的张力之外,王凯的小说之所以令人关注,还在于他的小说区别于当下的其他军事题材小说,因其轻松、幽默又不失冷静和热情,还带有一种青春的时尚与现代,显得较为另类。此外,王凯在小说叙事的结构处理上也较为用心,他的小说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注重设置悬念,埋设伏笔,又在结尾处常以欧·亨利的笔法,给出令人意外的结果,但仔细想想,又在情理之中。

强势的类型化与孱弱的现实性——2011年度军旅长篇小说扫描

□傅强

繁荣,在与电视剧联姻后,也造就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商业传奇,由此所引发的市场对稀缺优质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和资本重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尽管站在纯文学的立场上来看,高度类型化的军旅长篇小说就如同包装精美的文学快餐,总还是少了些独特的味道和丰富的营养;但从普通读者“浅阅读”的现实需求来说,直白干净的小小说语言,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浪漫传奇的人物命运,扑面而来的英雄气息,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伦理,剧本化的写作策略,瞄准当下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年读者的阅读变化,强调故事情节推进的速度,所有这些都使得军旅长篇小说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社会阶层、职业背景、教育程度、年龄层次的人们阅读期待。换句话说,纯文学领域中的退潮,在带动了军旅题材电视剧繁荣的同时,也直接成就了商业出版市场中军旅长篇小说的兴旺。《中国地》更像是一本“影视同期书”,但是电视剧的高质量或曰编辑较高的文学水平使得作品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质。小说对于乡土文化的亲近和细腻呈现使得战争题材与乡土题材较好地融合。赵老嘎这个人物形象有自身深厚的现实文脉积淀,而非那种脱离地域与历史文化背景腾空出世的性格英雄。小说故事发生的主体场域清风岭,可以说 是乡土中国的缩影和标本。当小说在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之余,观照到了历史境遇中的现实存在和文化风貌时,小说便具备了较为厚重的历史感。毕竟,传奇的光影下,如果缺乏厚重的生活存在作为依托,即便再精彩好看到铁血小说也难免显得虚妄苍白。海飞的《向延安》是一个类型化写作的集成之作,将谍战、悬疑、战争、青春成长融为一体,通过酷爱厨艺的富家少爷向喜从懵懂的革命青年,最后成长为沉着、坚定、成熟的革命者,再现了一批革命青年和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对理想与未来美好生活的追寻。李燕子的《咆哮的鸭绿江》是《寂静的鸭绿江》的姊妹篇,正像书名一样,作家此前寂寞沉静的创作状态已经变得激情澎湃,不可遏抑。小说的故事情节更

加曲折生动,人物更加众多,大家族、几代人的命运与辽南战争历史的宏大图景扑面而来,读来的确过瘾。但是较之此前水静流深、细腻温婉的笔触和对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细腻描摹,电视剧本化的《咆哮的鸭绿江》在庞杂的故事情节之外,没有用心去经营小说的文学性。以文学的标准审视,“咆哮”未必比“寂静”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过分依赖想象是可悲的,军旅生活的当代性往往又是最难写的。苗长水的《军事忠诚》所表现出的强大的生活概括力和穿透力是值得称道的,所呈现出的关注当下军旅现实生活、直面新军事变革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文学立场和写作伦理是十分宝贵的,也是值得提倡的。《军事忠诚》不仅从题材上填补了当代军旅文学的一个空白,也可以说是距离当下军队现实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阎欣宁的《遵义!遵义!》表现的是一個极为复杂的历史空间,在这种历史的断面上,生动地展示出作者对于历史的重叙、探寻与想象。战争所及的地理人情、山川风物、历史掌故、生活什物都在文本中得以细腻呈现,使得作品从历史的细部切入,赋予生活本体以丰富的色彩、声响与滋味。2008年,哈金开始构思《南京安魂曲》,然而困难重重,材料太多,难以取舍,找不到角度。在写作的3年多时间里,哈金一直努力让自己置身于70年前南京的气氛中,“自己很沮丧,但这是工作的条件,没有选择,常常哭完了还得写下去”。正是这部与泪水相伴而成的作品,让我们面对历史的伤痛,在追思和慰灵的小路上无声地行走。哈金的《南京安魂曲》证明了在通往伟大的写作中,技巧、技术和语言的花哨,并不一定比一颗质朴沉静的心灵更重要。裴指海的《往生》并非是以常规的结 构和手法来描写这段为人所熟知的历史,作者以当代军人的身份,不断地进入对前国民党军连长李茂才的采访与追问过程。时空穿越般的对话与沟通,意在寻觅中国军人的精神本色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本体。小说的故事情节不断穿行往返于历史与现实两端,第一人称的采访式叙事视角,既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和现场感,

看来,描述“非典型”士兵时,如何把握好人物刻画的尺度,拿捏好人物塑造的分寸,以及如何营造好人物所在环境中的性格、情绪与气质,并将之升华到美学的高度,应引起军事小说作家在创作中加以重视。

题材选择的突破

尽管战俘问题一直以来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在当代中国的军事文学创作中,涉及到我军战俘的文学作品也是较为少见的,但却是无法予以忽视的。相反,关于敌军的战俘题材,却在当下的军事文学创作中层出不穷,甚至成为创作和阅读中的一种特别的景象。然而,在2011年的军事中短篇小说的阅读中,我很惊讶地读到了两篇与我军战俘内容相关的中篇小说。这两篇小说不但与当代中国的两场战争有关,而且在小说的立意和技巧上也颇值得一提,他们分别是尹德朝的中篇小说《605高地》和张阳球的中篇小说《青铜闪电》。尹德朝和张阳球不约而同地试图对这样一个敏感的领域进行尝试性的突破,并将战俘塑造为一种不得已被俘虏且又不被现实所认可的悲剧英雄,可谓是用心良苦。

《605高地》虽然是一个英雄的悲剧,但却描述得异常高昂和激烈,充满了一种壮美和崇高的气息。这篇小说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很有意思的是,其一是塑造了一位成为战俘的悲剧英雄,其二是以小小说的笔触直接描述了朝鲜战争中的一场战斗失败的详细过程,其三是对于战俘归来后的命运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描述和反思。因此,这篇小说在我看来,不但对于当下的军事文学创作很有启发,对于战俘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小说中的主人公石茂成是志愿军168师49团的一名测绘员,在争夺605高地的过程中不幸被俘,但国内以为他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牺牲,不但将他评为烈士,还追授一等功的荣誉称号;而在交换俘虏并回到国内后,石茂成面对的却是尴尬甚至是残酷的人生命运,读后令人唏嘘感概。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以作为旁观者的记者角色介入,层层深入历史的现场,并通过那场战斗的见证者新闻摄影干事的回忆,为小说增添了历史记录的可信度,并进一步引起读者对于战争、历史和英雄的深层解读,从而具有了较高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近年来,尹德朝的多部中篇小说以描述朝鲜战争中的军人命运为主要内容,这些小说将人物的命运纳入时代的巨大变迁之中,使这些人物战后的命运与读者的预期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并以悲壮的叙事冲击形成了他的“朝鲜战争”小说系列。

《青铜闪电》本是一篇网络文学作品,相比传统的文学叙事,这篇小说在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显得较为大胆和自由,同时也有一种不事雕琢的散漫和粗粝。其实,网络上的军事题材小说数量庞大,虽然颇有些泥沙俱下的感受,但其中也不乏精品之作。《青铜闪电》描述的是南方边境作战中的一名英雄成为战俘后的命运,小说特别设置了三个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形成人物命运的巨大张力,一位是在侦察中牺牲的战士在战后所获得的种种荣誉,另一位在侦察中侥幸逃生,在战后得到世俗认可与成功,而小说中的主人公张格勒,作为实际参与侦察的重要人物,在激烈地搏斗后不幸被俘,但却在战后遭遇社会的种种残酷折磨和嘲弄,最后作者以一种意外的死亡来结束这种人生中的悲剧,虽有仓促之嫌,但实有怜惜之意,而作者大量叙述主人公在改革开放的经济浪潮之中,依然坚守作为人的基本良知所遭遇到的心灵创伤,使得这种英雄的精神品格更具有一种古希腊式的悲剧性。小说中的张格勒,这位被塑造而成的悲剧英雄,虽不乏理想化和符号化,但由此折射出的因观念差异而带来的困境,值得我们去反思。

又人为地阻滞降低了叙事推进的速度,形成了较为强烈的个性化风格。王筠的《长津湖》结合作者多年对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和对战争亲历者的采访,全景式再现了著名的“长津湖战役”的战争图景,填补了当代文学史上这一历史事件的题材空白。黄国荣的《碑》因其对战俘题材的深刻表现和对复杂人性的深度挖掘而呈现出令人震撼的文学品质。作家积4年多之功,7易其稿,将对凡人、军人、英雄以及对和平、战争和人性的深刻而痛苦的思辨,探索熔铸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主人公梦山传奇而悲壮的人生命运之中。小说对战争场面的描写秉承了“战壕真实”的风格,对现实生活的叙事和对人性的探索叩问更具有终极观照和哲学思辨的高度。

书写战争是军旅文学永恒的主题,但却并非惟一的主题,即便书写战争题材,历史生活的“现实性”也是必不可少。李晓敏的《抗战枪王》是典型的类型化文本,书写了一个发生在抗战时期的有关枪的故事,让人既有阅读的快乐,又打心底里生出英雄主义的豪气。但作者毕竟对于战争场面的真实状态缺乏亲身经历与厚重的生命体验,缺乏有意义的鲜活生动的细节。作者也无意为网络小说式的文本去下功夫研究历史真实和进行实地调研。从这样的战争历史题材中,让人感受不到历史的温度,也嗅不出战争的硝烟。小说文本层面展现更多的是娱乐化的审美趣味和电视剧化的叙事伦理。当下的军旅长篇小说存在着严重的“伪历史叙事”倾向,部分作家不去采访历史的亲历者,不去做田野调查,就依靠着有限的历史资料、飞扬的想象力和圆熟的叙事技巧,将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植入历史与战争背景中去,就可以炮制出所谓的战争历史小说。从中,读者看不到当年的现实生活场景,没有可信扎实的生活细节,感受不出时代的风貌和历史的温度,此种“伪历史叙事”自是难以令读者信服的。

复杂性是文学最重要的向度之一,作品内充满大量元素,非线性地相互交错着,犹如被风吹动的千万树叶,每片树叶或许并不知道树与自身的名字,但却共同构成了这株树的形象。类型化的军旅长篇小说过于线性直白,而且就类型化本身的发展而言也极其不均衡。“现实性写作的孱弱”暴露出的本质问题其实就是作家对于现实军旅生活的陌生和疏离,军旅现实生活在军旅长篇小说中的缺席是令人遗憾的,也是值得警惕的。

2011年岁末,因有机会集中接触一部分军旅诗歌作品,阅读过程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有大量的旧体诗词已经堂而皇之位列多年来总是新诗占主导地位的诗歌篇目中,而且经过了一轮大幅的挑选淘汰后,仍有不少轻松胜出。比如王凤英的《宁乡行》:焉知青霞近翠微/都料白雾按歌弦/弹碎风雷寻常事/笑看泥泞马上还/秋尽老英雄/秦驰新章大路开/拓北御南天下定/宁乡红树半云端。读这样的七言短章,有一种亲切的认同感。在当下大量表现中国革命历史、缅怀民族先烈丰功伟绩的诗歌作品中,像这样的辞意俱佳的生动灵秀之作,是完全可以在创作、创新的意义上看得见的。其中的“弹碎风雷”、“笑看泥泞”,都是有气势、无雕琢的洒脱之句,而“英雄醒”、“大路开”也是平常字字非常用,诗境与历史情怀融洽。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传统样式承载时代内容、诠释革命历史,再加上体裁数量的激增,这对于人们的诗歌阅读可能是一种丰富,同时也隐约让我们想到一个近来在各种场合常被提及的词:文化自信。当然,像数百年之前那样字斟句酌地填词赋诗,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这样的回归究竟意义几何,尚属未知;旧的诗词体制在表现纷繁复杂的现代感性方面能有多少作为的空间,也不见得乐观;而真正的文化自信与民族样式、民族传统之间的关系,更难说可以画上等号。所以,旧体的卷土重来,仍有待观察。

言归正传。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过去一年的军旅诗歌作品中,很大一部分都自然地转向了此类题材。以党旗、党史、著名共产党人为对象的歌咏,几乎每周都可以读到,以我接触到的部分作品看,在这些题材的写作中,最值得一提的毫无疑问是程步涛的诗集《记住那些地方》(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与大量的讴歌、礼赞之作不同,作者在这部诗集中流露出的是一种警醒和忧思。诗集中的“那些地方”,几乎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早期武装力量战斗过的大部分地区,也就是我们如今常叫做“革命老区”的地方。在作者的探访中,这些或经济还不够发达,或正因势利开展“红色旅游”的地方,在其历史上的巨大付出与今天的瘠薄、偏远乃至贫困之间,有着令人不安的落差。所以诗人希望我们记住那些地方,记住中国革命星星之火曾经燃烧过的“穷山恶水”。怀着一种谦卑的态度,心存感激却又有那么一丝忧伤,这就是《记住那些地方》与大部分“纪念诗”的不同所在。在一首同样是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的《我们的旗帜,我们的誓言》中,诗人是如此发问的:“九十年/我们听惯了颂词和赞歌/现在/还能不能掂一掂投枪和匕首/当年曾把它们投向敌人的营盘/今天/我们能否经得起它们的质询和拷问……”很显然,程步涛是在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良知,理性地回首集体记忆,真诚地清点历史足迹。

无独有偶,去年《诗刊》曾精选出版过一期早期“革命烈士诗抄”,读那些在狱中、在刑场和行军打仗途中写下的诗作,我们很容易被尚未看到中国革命成功就已经牺牲了的烈士们的精神力量所感动。细想之下,那些具有时空穿透力的诗作,我们都是由于其对未来中国的纯真梦想而直逼我们心房的。程步涛今天写下的这些诗作,似乎是一种回应、一种自我的质询、一种对宏伟事业的持续的牵挂。从半个世纪前的革命烈士们的诗作,到今天的这首《我们的旗帜,我们的誓言》,可见诗歌是完全可以抒情和表现社会价值、政治伦理和公民感情的,前提是诗人的真诚以及对人类进步事业的忠实。

发表于2011年的长诗,或者是篇幅较大的自由体诗,数量可观,如杨卫东的《浴血山河》、葛红国和张来进的《夸父逐日》、赵宏杰的《英雄年代》等。似乎是近年军旅诗创作的一个特点,许多诗人们都是近距离出手行文,洋洋万言,从中可以看出诗人们对作品气象、规模的向往。不过就已经看到的作品而言,多不免虚浮夸饰,徒有架构而缺乏灵动和生气。可以明确的一点是,除了以上所谈到的终极理想、情操境界,也存在着艺术历练、艺术自律的问题。归根到底,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如果在语言上缺乏节制和精炼,不重视词汇、语感等修饰功夫,仅仅将诗理解为某种思想意识形态甚至是简单概念的容器或承载工具,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相形之下,今天越来越多的旧体诗词创作,可能因为形式本身要求炼字炼句,反而会把诗人规范到具体的音韵字词之间,使其难有恣意妄为的机会。这对信马由缰的自由体诗,对某些毫无节制的所谓长诗写作,倒不失为一种矫枉过正。这就让我在本文结尾,不得不把话题再转回到旧体诗词上来。

粗略读下来,印象中像陈伯阳所填的十余首词,还有《屈全绳诗选》,都是可以看成一种写作上的严谨推敲与克制。尽管前者似乎多少以毛泽东诗词为“模版”,在意境、抒情模式甚至关键诗词的使用上都有因袭——此现象多见于涉及革命历史题材而采用旧体的写作者的实践,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而后者更崇尚古风古韵,历代边塞诗、军旅诗的影响依稀可见。新旧诗体孰轻孰重,这里暂不论,但在传统样式、民族文化审美又开始有所自觉的今天,如何在汉语诗歌中增添新的血液,毫无疑问到了一个新的时刻。无论格律诗、长短句,或是曲子词,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东西,虽则古雅稚嫩,虽则韵味悠长,但从其历史形成及其实际功用方面看(用于演艺、吟唱),可以说几乎是先天地就含有某种工艺化、程式化和游戏化的成分,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通过训练而掌握,所以对它们的“抬头”也需要清醒看待。现代文艺的精神是创造,追求的是对惯性审美经验的不断超越和更新,新诗也好,旧体也罢,关键恐怕还在于如何不落窠臼地处理好生命经验,把握住时代脉搏。而生命经验并非千篇一律的生死哀叹,时代脉搏也不是重复僵化的兴衰太息,我们永远都需要新词,需要坚定的破和立。

诗与真破和立——2011年军旅诗歌印象

□殷实